

孙本文

— 文集 —



第一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孙本文

— 文集 —



社会学原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本文文集：全 10 卷/孙本文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097-3321-9

I. ①孙… II. ①孙… III. ①孙本文(1891~1979) - 文集
②社会学 - 文集 IV. ①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5595 号

孙本文文集·第一卷

著 者 / 孙本文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谢蕊芬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杨艳敏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本卷印张 / 35.5

版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本卷彩插 / 0.375

印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本卷字数 / 608 千字

书 号 / ISBN 978-7-5097-3321-9

定 价 / 980.00 元 (全十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孙本文与 20 世纪 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

周晓虹

20 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时代：一方面，王朝崩溃、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内战频仍将中国人民一次次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民国初生、思潮汹涌、民情鼎沸、百业待兴也带给苦难的中国一次次重生之希望。在这一时期中，因急速的社会变迁而获得生命力的中国社会学，也在传入中国之后获得了第一次勃兴，尤其在 1937 年日本入侵之前达到了欧美以外的巅峰地位（O'Hara, 1961；阿古什，1985：73），并且迄今难以超越。而赋予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以学术灵魂的，当属三大学派：其一是以吴文藻为代表的在人类学调查和社区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社会学“中国学派”（李培林，2008）；其二是在社会主义思潮基础上生发而来的唯物史观社会学（李培林，2009）；其三则是以孙本文为代表的强调文化与心理因素对社会之影响的“综合学派”（郑杭生、李迎生，1999）。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文将讨论的孙本文及其代表的综合学派更是在那个时期的学院社会学中居于正宗地位的主流形态。^①

* 本文首次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12 年第 3 期，也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同意作者刊用此文作为《孙本文文集》编委会之代序；谨以此文纪念孙本文先生诞辰 120 周年、南京大学校庆 110 周年。

① 早在 1948 年，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赵承信就提出，中国社会学的主要派别是：孙本文代表的文化学派和辩证唯物论派，但前者是在社会学界占优势的正宗、主流，后者尽管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但并非正宗（赵承信，1948）。在这里，赵承信没有提及同在燕京的吴文藻及其学派，恐怕是将这一学派主要视为人类学而非社会学的学派。其实，作为这一学派主要成员的费孝通教授也承认，在旧时“中国的大学里人类学或民族学这个牌子挂不大出来，所以一直混在社会学系里。……我们这些东西混在社会学系里并不是为当时所有社会学界所同意的，至少并不是正宗。所以我觉得一直有些搞私货的味儿，说得好听一些，是一个旁出的学派”（费孝通，1999d/1957：18）。

一 从踌躇登场到仓促退场：历史的馈赠与剥夺

1892年1月23日，孙本文生于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吴淞乡张港村（现为七都镇吴淞村），^①后随父迁至邻近的薛埠村。张港和薛埠毗邻太湖，距离费孝通研究的吴江庙港镇开弦弓村都不过10余公里，因此有着十分相近的农业生态，居民大多以蚕业为生。尽管古吴越地区为“兵圣”孙武后裔聚集和繁衍之地，包括孙本文家在内的吴淞孙氏亦为孙子后裔，^②但吴淞孙家却世代为儒，有“十三代秀才”之美誉。其祖父孙忆轩是秀才，其父孙禄是贡生，都以乡村塾师为业，同时辅以蚕业为生，这后来甚至影响到孙家子女们的职业选择。^③

孙本文4岁开始启蒙，在父亲孙禄开设的私塾中苦读10年。13岁后先后在震泽镇明体学堂和吴江县立小学接受新式教育。1909年，小学毕业后的孙本文考入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到吴江县立小学任教。1913年，孙本文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大学四年中，孙本文一向学业优秀，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三年级之时，选修了留学日本的康宝忠（字心孚）教授首次开设的社会学课程。这不仅对他后来由哲学转向社会学的职业选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因为康宝忠心仪美国社会学家富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旧译“季亨史”）的学说之故，孙本文一生也成为像吉丁斯一样的具有鲜明的心理还原主义色彩的社会学家。

1918年9月，大学毕业以后的孙本文受南京高等师范附中之聘，担任

① 诸多有关孙本文的生平介绍，都因混淆了阴历和公历日期，而误将孙本文的出生之年写成1891年（如许妙发，1984；陈树德，1984；韩明谟，1987）。准确地说，孙本文出生于清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历应为1892年1月23日（陈定閔，1992）。

② 据《七都镇志》所载，“孙子第五十六世孙孙元纁于宋时由浙江泗安徙居吴淞庄桥，自成一支，为吴淞孙氏始祖”（丁学明，2001：第十二卷第四章）。

③ 孙本文的弟弟孙本忠，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桑蚕专家，1949年前任中央大学桑蚕系主任、教授，1949年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桑蚕研究所研究员。其实，受到这样影响的还包括同属吴江的费孝通一家。不仅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一生以蚕丝为业，而且还义无反顾地嫁给了自己的老师——中国蚕桑界的泰斗郑辟疆。选择蚕桑为业，也许如杨清媚所说的一样，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乡土工业的一份“士绅的关怀”（参见杨清媚，2010：106）。其实，无论是孙本忠，还是费达生，他们投身于桑蚕这类乡土工业，不仅因为这些乡土知识分子或者说“新士绅”大多有留学背景，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而且因为他们熟悉乡土社会，和乡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能够成为乡土社会变革的向导。

国文及哲学教员。1920 年孙本文考取江苏公费留美生，翌年四月赴美。1921 年 7 月至 1922 年 6 月，孙本文入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攻读社会学，并获伊利诺大学硕士学位。硕士毕业后，孙本文前往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哥伦比亚大学吸引孙本文的地方，在它不仅设有仅晚于芝加哥大学的世界上第二个社会学系（Faris, 1967: 11），而且名师聚集，除了有“世界上第一批社会学教授”（周晓虹，2001）之称的社会学系主任吉丁斯以外，还有因研究社会变迁而闻名遐迩的社会学家奥格本（William F. Ogburn，旧译“乌格朋”），以及在心理学系任教的社会心理学家加德纳·墨菲（Gardner Murphy）和罗伯特·伍德沃思（Robert S. Woodworth，旧译“吴伟士”）。两年以后，因为考虑到能够节省开支，在完成博士研究之后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朝圣”，孙本文从哥伦比亚大学转至纽约大学，师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心理学派的另一代表性人物莱斯特·沃德的追随者彭德尔（R. M. Binder）。1925 年孙本文凭《美国对华舆论之分析》一文，^①获纽约大学博士学位。这一年的 9 月，孙本文来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短短的半年中，他选修了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集体心理”以及埃尔斯沃斯·法里斯（Ellsworth Faris）的“高级社会心理学”和“社会态度”等课程，并受到托马斯（William Thomas，旧译“汤麦史”）等人的深刻影响（孙本文，1989：241，261）。

1926 年，回到上海的孙本文在大夏大学教授一学期课程后，于当年 9 月应聘担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3 年后，孙本文应中央大学之邀，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和教授，并在此后 20 年中先后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1930～1932 年）、中央大学教务长、师范学院院长等职，1941 年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1949 年后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1953 年院系调整中社会学系被取消，孙本文调任地理系教授，讲授统计学及国民经济计划；1963 年，孙本文调任政治系教授，从事资产阶级社会学之批判；1977 年南京大学哲学系恢复后调任哲学系教授。1979 年 2 月 21 日，孙本文病逝于南京。

从 1892 年到 1979 年，人生绵延 87 载，不能不谓之“长寿”。但令人遗憾的是，因为 1949 年后社会学在中国被无情“取缔”，孙本文真正的学术

① 孙本文博士论文的英文标题为：*China in the American Press: A Study of the Basis and Trend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Press.*

生涯从1921至1949年实际上不到30年。在此之前,从4岁开始启蒙,13岁接受新式教育,一直到北大哲学系毕业后28岁那年考取公费留学,是孙本文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在这第一个阶段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四书五经”读到西洋哲学,旧学和新学的熏陶为孙本文后来的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数十年中西方思想的浸淫,不但使后来的孙本文立志“始终以阐明社会理论为职志”(孙本文,1998/1932),而且事实上也影响到他后来的社会学中国化之努力。

孙本文人生的第二个阶段,1921~1949年,其中尤为重要的是1921~1926年留学美国的五年,是他的学术思想形成的主要时期。在这5年中,孙本文受到美国早期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也来自其后来短期访学的芝加哥大学。尽管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持一种齐美尔式的互动观点,并不能够归入心理还原主义阵营,但他们和信奉心理主义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吉丁斯、纽约大学的彭德尔一样,都对社会心理学充满浓厚的兴趣。^①孙本文的另一思想来源是文化学派的奥格本,虽然孙本文一再申明自己“属于综合派之林”(孙本文,1989:242),而不是单纯的文化学派或心理学派,但他又坚信,“人类社会活动的根本活动的要素,就是心理影响和文化影响”(孙本文,1928:24)。我们后面会看到,这种观点事实上一直支配着1949年前孙本文长达近30年的社会学学术生涯。

孙本文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始自1949年,终于1979年,长达整整30年。尽管孙本文本人并不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他还在事实上支持了第二个儿子孙世实参加中共的地下活动,^②并于1949年在中央大学教授会的推荐下担任了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积极护校,直到将中央大学移交至接管南京的军管会,但1949年的革命毕竟在客观上提前结束了他的社会学研究生涯。虽然从理论上说,1949年后的孙本文仍然一直在南京大学担任教授之职,但在这30年中他和社会学唯一沾边的工作,就是用它早先就熟悉但并不激赏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自己一生心仪的学科。作为长期受西方文化熏陶又在美国

① 事实上,在1930年前,社会心理学是美国社会学家的常规选择专业。据统计,1930年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1832名会员中,37%的人是社会心理学家;而到了1990年,这个比例在13265名会员中下降到19%(参见Riley,1960;Ennis,1992)。

② 孙世实早年在清华大学求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学联领导党组成员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附近牺牲,1949年后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获得博士学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可以想象的。1949年前，孙本文写道：“我们反对用唯物史观解释社会学，使社会学误为一种史观，一种主观的见解”（孙本文，1948，下册：235），乍看上去是想维护社会学的实证或经验品质，但却表明他对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敬而远之的疏离心态。1949年后，迫于急速转变的政治形势和越来越强大的外部压力，孙本文几度宣布“与资产阶级社会学”决裂（孙本文，1956，1957），转而学习马克思主义，甚至回信给向他索要著述的西方学者说：“我终于明白，我的所有著作只值得付之一炬，因此我无可奉送。以前我忽视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的学习，现在我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来读他的书。请不要再来信。”（参见 O'Hara, 1961）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毕竟是被动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情愿的。^①如果说，孙本文在1949年后的30年中有什么值得庆幸的事的话，大概要首推他竟然躲过了大多数社会学家都没有躲过的“1957之劫”。历史的吊诡在，或许因为1949年前与国民政府走得太近，革命胜利后的孙本文对政治乃至对自己的专业一直报以谨慎的态度，这反而使他未像北京的社会学家一样因幻想着恢复社会学而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被一网打尽。^②

纵观孙本文的一生，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是两个重要的时间结点。1921年，孙本文赴美留学，并在5年后满腹经纶回到自己的祖国。此时的中国帝制崩溃、民国初生，刚刚席卷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诉求，燃点起焚烧中国传统文化的火焰。处在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人向西方急切寻求一切良策，包括思想、主义和制度。孙本文信奉的社会学和他不太信奉的马克思主义都一股脑地涌入变迁中的中国，这为年轻的孙本文及在中国同样年轻的社会学踌躇登场拉开了大幕。虽然1937年后，“中经国难，进步迟缓”（孙本文，1945），但总体上说“中国社会学在近二十余年中，发展尤速”（孙本文，1948）。与此同时，多少有些“自觉”地与

① 1963年，也就是在1957年社会学学科的“复辟”潮流被迎头棒喝后不过6年，在重建社会学完全无望的境况下，孙本文私下里还十分认真地将自己1927~1948年发表和出版的著述编辑成20卷。从这近乎“堂吉珂德”式的“反抗”中，我们能够看到孙本文对待社会学的真实态度，工整的抄录中浸透着这位73岁的老人内心的悲凉、执拗与不甘。

② 在1956年底到1957年上半年，非常积极活动欲图恢复社会学学科建制的包括陈达、吴景超、费孝通、吴文藻、潘光旦、雷洁琼、袁方等在北京的社会学家们。与孙本文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949年前就与新生的红色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除了雷洁琼以外，这些社会学家几乎无一漏网，成了“右派分子”。而对社会学同样无法割舍的孙本文却采取了极其冷静的态度，在回信给问及恢复社会学事宜的先中央大学的学生陈定阔时，孙本文写道：“此乃北方诸教授之主张，我愿观其变。”（陈定阔，1992）

倡导“改朝换代”的马克思主义拉开距离的学院派社会学家孙本文，到1949年前也已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甚至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人物。他不仅长年担任中国社会学社的领导人，而且进入国民政府担任过公职，并成为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社会建设事业实际上的倡导者和筹划者之一。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后的孙本文受到了历史过多的馈赠，那么，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场新的、更为激进的革命却迫使他提前仓促退场，并几乎将他先前获得的一切剥夺殆尽。虽然因为为人谨慎，加之“革命烈士”亲属的身份庇佑，除了“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横扫一切外，孙本文并未受到激烈的批判或冲击，但是他内心却十分清楚，作为“前朝遗老”，在新的时代像他所心仪的学科社会学一样，自己早已处在社会和学术的边缘。

长期以来，社会学家与中国革命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直为人所不解，其实，他们的命运是由其投身的学科本身带有的激进和保守的双重性质决定的：前者追求“进步”，后者维护“秩序”。^①如此，一方面，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同情共产党，^②除孙本文外，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大多成了这股改朝换代的新兴力量的同盟者，在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眼中他们是蛊惑民心的“左派”；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因迫切需要解决秩序问题而带有浓郁的保守性质，在中国也不例外——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也都对“革命”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③他们希望以渐进式的改良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因此，在倡导不断革命的共产党人尤其是其领袖人物毛泽东

① 写在社会学之父孔德的实证主义大旗上的四个字就是：“秩序”与“进步”（阿隆，1988：23）。因为现代社会学不仅是相信进步和发展的启蒙主义的产物，也是与其对应的怀念秩序和稳定的传统主义的产物，它的出现“最初乃是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造成的旧秩序崩溃后果的消极回应”（周晓虹，2002：18），所以“秩序”与“进步”决定了社会学的学术品格。

② 后来，台湾学者叶启政思考社会学的学术品质时，还奇怪当年蒋介石撤离台湾时为何未带走任何一位社会学家。他曾就此问题请教过费孝通先生，得到的回答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都厌恶国民党，而同情共产党”。由此，叶启政认为社会学天生带有某种左倾的批判锋芒（叶启政，2003），但他未能指出社会学其实也具有维护秩序的“右倾”或保守功能。

③ 李景汉有一段话表明社会学家对改良和革命的不同态度：“现在有一个很时髦的口号是‘打倒’。凡不顺某人之眼，或不合某派之心的事事物物，统在打倒之列。……如此乱打乱倒不大会要紧，老百姓夹在打与倒的中间可就大受其罪了。社会调查的工作，不是破坏是建设，是要调查出来何者的确应该打倒，如何才能打倒，打倒的步骤为何，打倒以后拿甚么较好的来代替，否则先慢着打倒。吃粗粮固然不好，而犹胜于无粮饿死，破屋固然不好，而犹胜于无屋冻死。好食物有了准备之后再弃粗粮，好屋建筑之后再拆破屋。否则非弄成鸡飞蛋打，国困民穷，甚至亡国灭种不可。（李景汉，1933：5）

眼中，他们又是标标准准的“右派”。可以说，正是这种激进和保守的双重性质，使得社会学 1949 年前不被看好，1949 年后同样不受待见。可以想象，即使没有 1957 年的“反右斗争”，即使诸多社会学家不在此役中几乎“全军覆没”，在倡导“不断革命”的毛泽东时代也是难有“社会学的春天”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1949 年后社会学在中国“被废黜”的命运是由这一学科的固有品质与那一时代的社会性质之间的内在冲突决定的。

二 文化决定论与心理还原主义的综合学派

自 1927 年出版《社会学之上的文化论》一书，1949 年前的 22 年间孙本文出版的个人著作有 19 种之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社会学原理》（1935/1944）、《现代中国社会问题》（1942~1943）、《社会心理学》（1946），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学》（1948）。在这些著作中，孙本文系统阐发了自己的社会学观点和理论体系。有意思的是，尽管孙本文一生鼓吹文化和心理两大因素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决定性作用，但他却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列为“整体论者”或“综合学派”，并发愿“应采孙末楠，汤麦史二氏之方法，乌格朋之观点，冯维史（L. Von Wiese）之系统，麦其维（R. M. Maclver）之深思，沙罗坚（P. A. Sorokin）之广博，而加以卫史德麦克（E. Westermarck）之切实”（孙本文，1998/1932）。在他看来，综合学派“代表一种综合的趋向，其要点在于认识社会的整个性，及其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并欲确立社会学派的体系”（孙本文，1989：257）。

尽管孙本文将自己归于“综合学派”，并一再声称“著者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并不蔑视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孙本文，1989：241），但事实上真正贯穿其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线索就是两条：文化和心理。就像他多次表示的那样：“著者个人见地，以受美国乌格朋、汤麦史两教授的影响为最大”（孙本文，1989：261）；而“人类社会行为的根本活动的要素，就是心理影响和文化影响”（孙本文，1928：24）。

孙本文的文化决定论观点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奥格本。在 1922 年写成的《社会变迁》一书中，奥格本提出了后来为文化学派所恪守的两个原则：第一，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的变迁，促成文化变迁的四大因素是发明、积累、传播和调适（Ogburn，1950：377）；第二，“由于现代社会变迁的源泉主要在于物质文化”，而知识、信仰、制度和风俗等非物质文化或适应文化总是略慢一步，因此，在不同文化及其变迁之间存在差异，即所

谓文化滞差或文化堕距 (Culture Lag) (Ogburn, 1950: 200)。

作为奥格本的弟子和传人,孙本文对上述文化理论的传播称得上不遗余力。不仅他自诩为“国内社会学界提倡重视文化研究的第一人”(孙本文,1989: 246),而且人们也公认,“在中国,孙本文是第一个介绍和研究文化理论的,因此他被视为文化社会学家”(Li and Others, 1987)。在他“最有分量的代表作”(韩明谟,1987: 120)《社会学原理》中,孙本文以一种与奥格本酷似的语气写道:“文化为人类社会普遍的要素,无文化既无社会。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文化,故文化为人类的特产,亦即人类所不可或离的要素”;如果用简单的语言来说,“文化实为社会成立的基本要素”(孙本文,1935: 297~298)。既然孙本文和奥格本一样将文化视为社会的基本要素,他自然也会再进一步,在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之间画上等号:“社会变迁,简单说,就是社会现象的变迁”,而最终“社会变迁似只是文化变迁而已”(孙本文,1935: 544~545)。

尽管孙本文是中国社会学界倡导文化研究的“第一人”,但显然这一时期对“文化”有兴趣的绝非一个孙本文。用孙本文自己的话来说,包括“孙(本文)、黄(文山)、陈(序经)、吴(文藻)、费(孝通)五氏,可说是中国社会学中文化论者的重镇”(孙本文,1945)。虽然观点各异,但上述五人多数受到奥格本的影响,其中孙本文、黄文山和吴文藻还是奥格本的学生。在奥格本之外,中国社会学家对文化研究的另一兴趣,来自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及其功能论学派。尽管奥格本强调文化的变迁尤其是物质文化的变迁,而马林诺夫斯基则强调文化的“功能”,即它对“应用文化的人们所具有的意义”(费孝通,1999a/1937: 510),但显然学者们对文化的宽泛理解并没有什么不同,以致同时受惠于两者的吴文藻会说:“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因此,也可以说,社会学便是社区的比较研究,文化的比较研究,或制度的比较研究。”(吴文藻,2010/1940: 4~5)其实,无论是孙本文还是吴文藻,将文化等同于社会,既受到英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响,^①也是倡导

① 比如,众所周知,在美国称之为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在英国则称之为社会人类学。这说明文化和社会在人类学家看来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一般来说,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都同意,“文化最简单的定义可说是某一社区内居民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物质的、概念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的总成绩”(吴文藻,2010/1936: 485),它与作为人类共同体重要形态的“社会”当然有所区别。但是,既然文化就是社会或人类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之总和,是其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这两个概念当然也就可以互换使用。

从文化入手革故鼎新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倾向。比如，倡导“全盘西化论”的上述“五氏”中的陈序经氏，在 1933 年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讲演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就是：“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陈序经，2004/1933：3）如此，无论是改造中国文化，还是引进西方文化，通过文化的变迁推动中国社会之改造自然会成为包括孙本文在内的那一代社会学家的共同看法。

如果说孙本文的文化决定论的观点来自奥格本，那么他的心理还原主义的观点如上所述则来自一系列美国早期社会学家。按时间顺序，孙本文接受的影响先后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吉丁斯、纽约大学的彭德尔和芝加哥大学的托马斯。其实，在这些人的背后，还有一个孙本文虽无直接接触，但却无法摆脱其影响的布朗大学教授莱斯特·沃德。不仅彭德尔是沃德的学生，作为美国社会学会第一任主席，沃德事实上影响到整个美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包括萨姆纳（William Sumner，旧译“孙末楠”）、吉丁斯、罗斯和埃尔伍德。“一直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还可以在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对社会心理因素的强调中，发现莱斯特·沃德的精神踪迹。”（周晓虹，2002：194 ~ 195）

美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基本上都是倡导心理进化的还原主义者，是 19 世纪下半叶生物还原主义退场后的顶班人。此时，凭借着自然科学的进步泛滥而起的形形色色的自然主义社会学派，已经无法依赖粗俗的生物学甚至是机械学类比应对人们进一步揭示社会生活本质的要求，解释社会的力量开始从斯宾塞时代的生物学转向冯特时代的心理学。如此，自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一种后来被称为“心理学主义”（psychologism）的思潮开始在社会学领域蔓延。用索罗金的话来说，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始于将个体的心理特征作为研究变量，并试图将社会现象解释为心理特征的衍生物或具体体现”（Sorokin，1928：600）。这种带有还原论倾向的心理学主义具有实证主义、规避进化论、唯名论、非互动主义和反理智论五大特征（Szacki，1979：246 ~ 247），它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是那个痴迷于人类非逻辑行为的意大利人帕累托，以及那个将模仿视为“最根本的社会事实”的法国人加布里尔·塔德。我们知道，正是在与塔德的心理还原主义对峙的基础上，涂尔干提出了“社会事实只能通过社会事实来解释”的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反对将具有“突生性质”的社会事实还原到个体的或心理的层面去解释。

不过，在美国人接触社会学并参与社会学的创建工作时，“涂尔干还只

是来自海外的一种社会学声音而已”(Faris, 1967: 9), 更有影响的声音还是来自生物学尤其是心理学的各种还原主义主张。比如, 前述几位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就无一例外是心理还原主义者。沃德推崇斯宾塞的进化论, 但他感兴趣的不是有机体的进化而是精神的进化, 因为坚信“社会力量也是在人的群体状态中发生作用的心理力量”(Ward, 1893: 123), 他对用心理规律解释社会过程怀有坚定的信心。萨姆纳既是斯宾塞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戴者, 但同时也是心理还原主义者。在他著名的“民俗”成因的解释中, 一是个人和群体的生存利益, 另一就是饥饿、性欲、恐惧和虚荣四种本能欲望。而吉丁斯同样认定: “社会, 就其词语原意来说, 是指同伴关系、交谈和交往, 一切真正的社会事实就其本质而言, 都是心理事实。”(Giddins, 1896: 3)

从哥伦比亚大学到纽约大学, 再到芝加哥大学, 孙本文在美国的五年学术生涯决定了他与心理社会学进而与心理学主义的终生纠葛。他的心理还原主义倾向鲜明地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①和自己的老师吉丁斯一样, 孙本文认为社会事实就是心理事实, 因为“从本质上讲, 社会只是人与人的活动——人与人的行为; 仅就这‘行为’的观点说, 竟可以把‘社会’看作‘心理’的现象”(孙本文, 1989: 242)。②既然“我们所见人类社会上种种方面的活动, 无非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表现”(孙本文, 1928: 24), 那么, 十分自然的是,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 凡与社会行为有关系的各种现象, 社会行为的共同特点, 以及社会行为间的互相关系, 社会行为的规则及其变迁等, 都在社会学研究范围之内”(孙本文, 1944b: 16)。③受到托马斯的影响, 孙本文对“社会态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并较早用此来解释在社会问题的浮现过程中主观建构的意义(Blumer, 1971; Spector & Kitsuse, 1987), 他意识到“社会问题的有无, 须视社会上多数人态度为转移”, 因此, “社会问题的产生, 其关键在社会态度”(孙本文, 1989: 242)。其实, 单单论及社会态度对社会问题的建构作用并不足以说明一个人就持有心理主义立场, 孙本文的问题在: 止步于此, 未再进一步追述社会问题的客观基础, 以及人们建构时所依赖的解释性框架还受制于客观的社会及舆论环境(Gamson, 1992: 52)。④正因为信奉心理主义, 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代宗师, 孙本文的“社会心理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并不属于“社会学家的社会心理学”。我们这样说的理由在, 孙本文虽然“视‘社会心理学’为社会学中一基本部门”(孙本文, 1989: 242), 但他研究的却是“社

会中个人的行为；一方面研究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一方面研究社会所受个人的影响”（孙本文，1991/1946：21）。或者说，“现代社会心理学在内容方面注重个人在社会中的调适行为，并重视整个社会情境的背景”（孙本文，1944a）。在这些表述中，研究的焦点是“个人”，而从齐美尔到乔治·米德所倡导的个体和群体间的“互动”是没有位置的。因此，借用孙本文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社会心理学亦可谓之‘个人社会学’或‘心理社会学’”（孙本文，1991：22），与倡导群体和互动研究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基本上还是南辕北辙。

三 中国社会学的建设者与评论人

对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而言，孙本文最重要的贡献并不是上述社会学思想、体系和观点，而是 1926～1949 年的 20 余年间，他对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所起的推动作用。我们知道，在社会学不到 200 年的短暂历史中，美国人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W. Small）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1892 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1895 年，他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本社会学专业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AJS*）；1905 年，他又创办了至今统治着美国社会学界的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前身——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上述学术建制的重要性在 1978 年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再度体现出来：费孝通将“学会、研究所、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和书刊出版部”称为“五脏”，将与之对应的包括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在内的六门课程称为“六腑”（费孝通，1999e/1982：287），费孝通为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五脏六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孙本文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此前斯莫尔在美国社会学中的角色，或此后费孝通在 20 世纪 80 年代重建中国社会学中的角色。虽然早在 1903 年严复就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成为“西洋社会学输入中国的起点”（许士廉，1931）；1906 年京师法政学堂首次开设社会学课程；1913 年，美国人葛学溥（Daniel Kulp）在上海私立沪江大学首创社会学系；甚至 1922 年留美社会学家余天休还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团体——中国社会学会，并出版了双月刊《社会学杂志》，但这些零散的努力在 20 年代之前并未形成气候，“中国社

会学会”更是在成立不久便无形消散（许妙发，1983）。历史似乎在等待着孙本文出山。

1928年，留学美国的吴景超博士回国出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途经上海时，复旦大学教授孙本文为吴景超洗尘，遍邀上海各大学社会学教授作陪。席间，清一色留美博士孙本文、吴景超、吴泽霖、应成一和钱振亚提议成立地区性的东南社会学会。10月，学会成立，并出版会刊《社会学刊》，孙本文等出任首任编委。这一地区性学会的成立推动了全国性的社会学团体的成立。1929年，已经出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孙本文联袂北京的许士廉、陶孟和、陈达，以及东北的刘强，联合发起在原有东南社会学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社会学社，并担任第一任正理事（会长）。1930年2月，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成立，《社会学刊》也改为中国社会学社会刊。

在此后近20年内，尽管其间历经八年抗战，中国社会学社先后召开过9次年会，主题涉及人口、家庭、社会规划和战后社会建设等，而“中国社会学社的中心人物是孙本文”（Wong，1979：21）。鉴于中国社会学社是1949年前近30年间中国社会学界“唯一的学社”（孙本文，1989：279），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社的地位事实上反映出他在整个中国社会学界的地位。作为那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界尤其是学院社会学的领头羊，孙本文不仅是社会学的建设者，而且常常跳出局外，充当了“首席评论人”的角色。我们这里一再引证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就既是中国社会学的一部简史，也是其发展状况的一份诊断书。

在《当代中国社会学》开篇中，孙本文写道：“本书讨论当代中国社会学，似应限于现时中国流行的社会学；但现时流行的社会学是由过去社会学演进而来，不有过去，何有现在！而况中国社会学从西洋传入以来，甫逾五十年，凡奠定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基础之人，都是当代学者。因此，本书虽名为当代社会学，实则无异一部中国社会学简史”（孙本文，1989：序言）。按照孙本文的自述，他撰写《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目的在：①使初学之人明了中国社会学的起源与发展的经过状况；②使初学之人能在此小册子中知道中国社会学发展时期中各种译著的性质与内容，以及各位社会学者的学历景况，借以明白中国社会学思想的来历及其流派（孙本文，1989：3）。虽然孙本文一再声明，这本书是为“初学之人”了解中国社会学而撰写的，但显然作者更加希望通过这一著作对社会学在中国的50年历程做出历史性的总结。

《当代中国社会学》全书不过 20 余万字，分为上下两编，但两编的篇幅却极不相称：上编占全书正文的 80%，述及中国社会学的起源与发展，包括普通社会学、社会进化与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社会心理学、社会思想与社会学史、农村与都市社会学、社会学方法、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以及其他社会学等八个部门的发展进程，并在最后一章介绍了实地调查、社会学课程、社会学团体和刊物的具体情况；下编仅占全书正文的 20%，讨论分析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的主要派别和基本观点，其中包括注重心理、文化、生物、经济、整体（综合）、社会问题和社会实地调查等七个社会学学派。孙本文之所以能够在社会学界纵横捭阖，不仅在于他留学美国期间曾受到了最好的社会学训练，而且在于他回国后“始终参加这 20 余年以来的社会学运动；比较对社会学有贡献的学者无不相熟，他们的个性和造诣大体上知道得还清楚”（孙本文，1989：3）。这一切使他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学最合适的评论人。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作为建设者，还是作为评论人，严格说来孙本文的行动和视野都基本限于学院社会学或经院社会学的大墙内，他忽视了同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界发生着的其他重要甚至更有意义的努力。比如，尽管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国社会学界基本上悉数转移到大后方，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继续研究，使得“社会学不仅未见衰落，反有进步的气象”，但在孙本文眼中其成就还是限于“社会学知识渐见推广”、“社会学学理渐见系统化”，以及“注重社会学应用的研究”（孙本文，1944）；他没有看到，“抗战把以前门禁森严的大学疏散到了后方的乡村里，把以前可以终日和普通人民毫无接触的学者送入了破庙和农舍里，书籍的丧失和国外杂志的断绝，使他们无法在图书馆里去消磨研究的精神，再加上国家的危机，实际问题的严重，他们无法不正视现实”（费孝通，1999c/1947：413）。这种现实的逼迫，使得抗战前为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中国学派”所倡导的社会研究，通过此时在中国西南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实地研究，“成了战时中国社会学的共同风气”（费孝通，1999c/1947：413）。

如果说孙本文对深入现实的实地研究还只是忽视的话，那么他对导源于社会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社会学则基本上持警惕的疏离态度。早在 1933 年，孙本文就一再申明，要了解社会学就必须厘清有关社会学的两种误解：一是将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相混；二是将社会学当作唯物史观（孙本文，1933）。抱着与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撇清关系的“纯学术”态度，孙本文及其综合

学派，未介入过唯物史观社会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引发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诸种大争论（李培林，2009）。它们相互处在费孝通所说的“碰不上平行线上”，以致这两个学派虽然都因“五四运动”而起，但在“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却最终“分道扬镳”（费孝通，1999c/1947：413，410）。

既然不愿将社会学演变为社会调查，或将社会学锻造成“社会革命的实际运动”（费孝通，1999c/1947：410），同时恪守“书生事业之大半，在读书研究”（孙本文，1998/1932），孙本文所代表的学院派社会学自然最终只能执著于“影响社会现象的各种因子间孰为重要的辩论”，以致“西洋的社会学不论哪一个派别，都反映着一部分社会现实，但是当它被带进中国来，却只剩了一套脱离了现实的空洞理论”（费孝通，1999c/1947：411～412）。其实，希望将社会学“关在教室里”（费孝通，1999c/1947：411）成为一种“特别的学问”（孙本文，1944a），不仅源于孙本文的书生本性以及因此形成的与现实生活的隔膜，而且更重要的恐怕也是为了防止社会学与倡导“革命”的社会主义或唯物史观纠缠不清，并因此伤及单纯的学院社会学在实行“思想统制”的中国社会的成长。^①

事与愿违的是，尽管孙本文一生都刻意与“社会主义”尤其是“革命”保持某种距离，但在翻天覆地的中国，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心仪的学科最终都没能摆脱革命的“眷顾”：轰轰烈烈的革命不仅将他的儿子孙世实卷入洪流，也促成了他作为社会学家角色的仓促退场，同时还“废黜”了从西洋流入、在中国生长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学。考虑到《当代中国社会学》初版于 1948 年 5 月，离国民党政府的彻底溃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过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几乎可以说作为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学院社会学的“掌门人”，孙本文似乎已经觉察到一个时代的行将就木，而恰逢此时由他

① 尽管作为饱受西方文化之熏陶的社会学家，孙本文信奉民主自由，但和费孝通等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与国民政府的“思想控制”政策“唱反调”的社会学家。相反，1938 年，在《战时社会统制的必要》一文中，孙本文还写道：“思想问题，在知识分子方面，尤其是知识青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问题。思想不统一，非但足以妨害国家中心信仰，而且可以摇动后方人心；关系于抗战前途者至大。我政府与最高领袖屡次表明，三民主义是建国的最高原则，这是无可移易而无可支援的。因此，凡与这个最高原则冲突的思想，政府应加以统制。”（孙本文，1938）考虑到自此到稍后的一段时期内，“国民党对师生的思想控制，在联大导致了尖锐的冲突”（费正清、费维恺，1993：473），在国民政府的“第一学府”中央大学任教的孙本文的观点起码是与国民政府的政策相吻合的。